

现代化图景中的邓小平社会发展动力机制探析

王 丽

(河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律学院, 天津 300401)

[摘 要] 邓小平从解决“后发展”问题的独特视角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为基点,以现代化为蓝图,从社会发展的主体要素——人、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启动机制——解放思想、社会发展的调控机制——改革、社会发展的驱动机制——对外开放、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义利统一等方面展开思考,有效解决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动力问题,始终保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

[关键词] 现代化; 邓小平; 社会发展动力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1-0042-(04)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无不显示了邓小平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巨大威力。

一、人——社会发展的主体要素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³⁸⁰正如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指出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实践的主体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邓小平意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并善于集中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认为改革开放中的许多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他支持了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说服了人民允许“傻子瓜子”继续经营,赞扬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等,^[2]这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力量源泉。

邓小平还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受过教育和掌握科学技术的现代人,现代化建设成就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他把人的素质和人才问题视为中国迎接新经济

挑战的关键,视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和主要动力。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3]在经济全球化迅速扩展、知识经济兴起的时代,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有效的工业管理制度、政治组织制度,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人还没有实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不具备操作这些设备和发挥这些制度的能力时,再先进的技术、再完美的制度也是一堆废物。邓小平深谙其中的道理,他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极力主张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二、生产力——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根据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社会进步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中轴线进行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坐标轴上,经济发展的曲线愈是偏向生产力轴,则社会财富的增长愈快,社会进步的幅度愈大,反之,则较慢,较小。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想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因为“在‘现代化’最初起飞之后,经济领域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

[收稿日期] 2007-12-17

[作者简介] 王丽(1976-),女,河北青县人,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

居首要位置,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于现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现代化的延续,持续增长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4]。诚如有的学者指出,如果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再加上两位“E小姐”,即在民主后加上经济,科学后加上教育,那么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改写。具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国,在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伴随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只有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解决国内其他社会问题奠定物质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建国后,我们也有忽视经济建设的切肤之痛,阶级斗争不断,政治运动频繁,发展生产力被排到次要地位,从而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航道,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邓小平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把握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他说:“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6]

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地位 and 作用,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认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主要看技术创新的程度,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他指出:“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靠科学技术的力量。”^[7]在科技革命兴起、科学知识膨胀的时代,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智能要素,已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它通过提高并强化劳动者的智力和生产技能,改进生产工具,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处于一切生产力形式、过程和因素的首位,在生产力诸因素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以富有战略性的眼光,敏锐地注视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的趋势,极为重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变革的“伟大杠杆”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三、解放思想——社会发展的启动机制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中华民族能否实现复兴,关键因素就是能不能打破长

期以来形成的精神枷锁,突破思想禁区,实现观念更新。

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受传统的封建主义保守落后的价值观念、殖民地时代形成的奴性文化的影响,人们形成了消极落后的思维定势。又由于受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的影响,导致了僵化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压抑着人们的创造精神,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种思想禁锢,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拦路虎、绊脚石,并广泛渗透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把中国拖入经济崩溃、社会破败的泥潭。为此,邓小平痛定思痛,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143]在他看来,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准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8]^[141]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左”的思想的牢笼,打破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思想禁锢,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启动了现代化进程。正是依靠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正是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的号召,使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在计划和市场是“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争论中,又一次摆脱了思想的禁锢,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国内外风险的考验,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到了新阶段。

四、改革——社会发展的调控机制

邓小平把改革视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认为必须通过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他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9]“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10]^[142]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属于经济社会形态视角内的社会转型。中国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还

要完成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相应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超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教条主义公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主导作用,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对于一个实行封建专制上千年的国家来说,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比“一千台蒸汽机的作用更大、更长远”,它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和精神动力,保证了生产力发展不受干扰,增进了社会生产的总效益。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还蕴含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技术社会形态的转型。就经济关系的技术形式而言,农业社会采取的是与手工业相适应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而工业社会采取的是与现代工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形式;就政治关系的技术形式而言,农业社会中大多采取专制的或集权的政体形式,而工业社会通常采取民主政体形式;就思想文化体系的技术形式而言,农业社会中具有明显的迷信和愚昧色彩,而工业社会中现代科学充分发展,科学精神广泛渗透于各个方面。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市场经济)、政治现代化(民主)、文化现代化(科学)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反映了从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11]由此可见,邓小平领导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部驱动力,“它将根本超越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农业自然经济——封建专制统治——封建蒙昧文化’的封建主义三位一体,这是一种‘妈女士(市场经济)——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三结合的新型体制,有助于解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历史难题;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崭新创造,它将对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科学文化的结合方式,做出新的突破和新的超越。”^[12]

五、对外开放 —— 社会发展的驱动机制

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敏锐把握当代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清醒判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情和长远发展目标,提出“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

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13]他意识到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他说:“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14]而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赶超式发展在封闭状态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已表明,大跃进试图实现赶超式发展,不但没有实现经济的跃进,反而变成“左”倾冒进。因为在封闭的环境内发展生产力,只能从上辈到下辈继承下来,实行渐进性地低速度积累。一旦落后了上百年,也就意味着短期内这种距离是不可能跨越的。并由于突发事件的发生,会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各种发明的国家处于一切都从头开始的境地,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发展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历史上的腓尼基人、玛雅人文明的毁灭,中世纪的绘画艺术和玻璃生产的遭遇,就是例证。然而在对外开放的世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存在着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规律”,在交往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或国家都是用自己的最新成果,用自己富裕的东西或优势部分去交换自己短缺、不足的东西,这就等于自己增长了一种新的东西,获得了一种爆发力。由于“相加效应规律”就是上百年的差距,在几十年内超越也是不足为奇的,社会发展的奇迹和赶超现象由此发生。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现经济赶超式发展就成为可能。因此,邓小平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³⁷³,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效迅速地实现自身发展。

六、义利统一 —— 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

邓小平善于处理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在使人们的物质利益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还善于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能动性,使毛泽东时代倡导的“精神变物质成为可能”。

在各种需要和利益中,人们首先追求的是物质需要和利益,这是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所证实的,更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性思辨中得出的结论。建国后,毛泽东试图通过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激发人们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和拼搏精神,但他把人的精神当作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纯真正动力,而忽视了经济手段,结果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主张不断给人们提出新的更高的任务的办法,使人们保持新鲜感和积极性,这在心理学上不无道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使劳动者通过

自己的劳动不断增加物质利益,才能使积极性长盛不衰。”^[15]从哲学角度来说,“抓革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促生产”则属于物质生产领域。而毛泽东简单地把革命和生产物化为一体,并把革命置于生产之上,这实质上是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绝对化了,显示出一种主观意志论的哲学特色,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6]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用脱离物质基础的乌托邦来长久地许诺人民,单靠政治动员激励群众参与现代化,忽视人们的经济利益,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束缚。邓小平深刻剖析历史的沉疴,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8]146}

同时,邓小平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后发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单靠物质力量的推动是不可能成功的,还需要有独特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乘虚而入,中国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也沉渣泛起。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活动的消极影响也渗入到人们的头脑。思想道德领域的这些消极现象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也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0]144}他反复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并以此作为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促进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全面兴盛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王伟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9.
- [3] 邓小平. 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0.
- [4] 张蕴岭. 亚洲现代化透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56.
- [5]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 [6] 邓小平.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0.
- [7] 邓小平.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7.
- [8] 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邓小平. 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 [10] 邓小平.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 贾高建.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双重转型[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2):17.
- [12] 张岱年,王东. 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J]. 教学与研究,1997(5):11.
- [13] 邓小平. 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2.
- [14] 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M]//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
- [15] 虞和平. 中国现代化历程:第3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050.
- [16] 吴敏先,孙成军. 论毛泽东晚年的“抓革命,促生产”思想[J]. 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4):123.

[责任编辑:陈可阔]